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四川考古

赵殿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二十世纪 80 年代前后被称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四川考古跟上时代步伐，进行了一批目的性较强的工作，围绕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区系类型、文化序列等课题，取得不少成果，初步构建了四川考古文化的主要阶段，为探讨以巴蜀文化为中心的古文化发展进程和具体形态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四川考古；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考古学文化序列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1-0085-06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被称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不仅涌现出众多举世震惊的考古发现，而且从制度队伍建设到学术思想解放都产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四川考古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之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围绕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区系类型、文化谱系、地区性文化特征等课题，在古人类与石器时代文化探索、巴蜀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秦汉隋唐宋明时期的墓葬特征、以及科技艺术考古等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初步构建了四川考古文化的主要阶段，为探讨以巴蜀文化为中心的古文化发展进程和具体形态，及其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特别是我省围绕“区系类型研究”和“古代文明探索”等两大课题，进行了一批目的性较强的工作，以三星堆、十二桥遗址、新都大墓等发掘，和文物普查、三峡考古调查为代表，使考古文化序列和巴蜀文明研究有了较大进展，是四川考古的系统发掘和蓬勃发展的阶段。这里以本单位的情况为主，根据个人的体会和心得，简要回顾一下 80 年代前后的四川考古进程和收获，作为国庆 60 年的一点纪念。

一、机构建设与思想解放

(一) 机构的健全和队伍的建设

1952 年我省成立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下设文物工作队，负责全省考古发掘和文

物保护工作，成绩显著。三年困难时期精简机构，将“文管会办公室”并入省博物馆，成为中层机构，只管地面文物，而考古发掘则由省博物馆古代史部负责，影响了考古工作的开展。文革后亟需恢复独立又统一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机构，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国家文物局专家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1981 - 1982 年重新建立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下设“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成为县团级独立单位，内设考古队、文物队、《四川文物》编辑部等部门，共同负责全省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宣传工作。1985 年初又增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的形式，从而理顺了工作关系，并与国内外同行接轨，有力地促进了我省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1984、1985 年，单位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先后建成了新的科研办公楼和宿舍楼，大大改善了工作和后勤条件。

在健全机构的基础上，单位又重点抓了队伍建设。首先把文物考古专业人员集中在一起，根据知识结构适当分工，发挥所长。又先后从全国五六个不同的大学有目的地引进十多名考古和历史专业毕业生，既增加了力量，又促进了交流。对前期进入的工农兵学员，分批送入相关大学进修，有些还读了研究生班，大大提高了业务和工作水平。特别是从 1984 年起，将年轻的考古人员相继送到国家文物局举办的“考古发掘领队培

训班”，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后，都取得了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工地的领队资格。这就为八十年代前后的考古事业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恢复评定业务职称、制定奖励办法、做好后勤保障等措施，特别是鼓励表扬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委以工作重任等方式，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在工作繁重、条件较差、补助很少的情况下，单位出现了钻业务、干事业的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使新的发现和成果不断涌现。

（二）考古制度的建立和学术思想的开放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的大发展，是与考古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学术思想的解放密不可分的。其中对四川考古影响最大的，要属考古发掘规程和考古领队考核两个制度的建立，以及首次全国考古汇报会、三星堆十二桥考古座谈会在成都广汉的举行。虽然这些活动是由国家文物局主导主持进行的，但四川积极地参与其中，并在实践中直接受益，成为改变四川考古面貌的重要转机。

国家文物局从20世纪80年代初着手编制《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一方面是要改变文革的混乱，更主要的是要提高整个考古工作的水平。1984年4月在成都召开“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期间，已形成初稿，并在一定范围讨论。会后集中各地十多位专家，专程到川西、川南、重庆等地，边考查边讨论，使规程基本定稿。我和单位的一些同志有幸参与了部分工作，充分感受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5年《规程》正式颁布实施，并通过每年颁发考古证照、考古汇报会、工地检查组、和考古领队培训考核强行落实，很快改变了当时的考古工作面貌。

“考古发掘领队培训班”是与《规程》相配套的另一项重要措施。从1984年起，要求文革后毕业并工作两年以上的考古专业大学生，必须到在考古现场举办的培训班实习数月，由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直接组织指导，并通过严格的考核，才能取得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工地的领队资格。“领队培训班”被考古界戏称为“新黄埔”（以别于五十年代初“考古训练班”的“老黄埔”），学员很快成为新时期考古事业的骨干。我省从第一期起，连续送去十多名学员，并都通过了考

核，取得了领队资格。他们为我省以较高水平开展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特别是重点古遗址的发掘和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学术思想的大解放。以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等学说为代表，提出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观点，有力地打破了“中原文化中心说”和“一元论”的传统看法。它不仅被各地考古新发现所印证，更是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各地考古事业的发展。四川考古也深深介入这场讨论之中，对四川考古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突出表现在国家文物局和专家组在成都召开的两次会议之上。

1984年3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是国家文物局为贯彻新的工作方针和管理办法的一个重要会议，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会议，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考古“黄金时代”的到来，被学界称为“成都会议”。会上围绕“提高学术水平，提高工作质量”的主题，总结交流了文革后的考古工作，指出“我国考古工作和考古学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1]，并确定了完整的考古管理审批和汇报制度。会上会下对学术思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包括“区系类型”等观点，大大活跃了考古界的学术空气。会议前后全国有大批专家领导入川，具体检查指导了我省考古工作。如苏秉琦先生在看了三星堆等处出土标本后说，“我看到巴蜀文化了”，它们“成系统，有特征”，是一个“独特的古文化”，是“学科生长点”，“可能成为一个学科的分支，中国考古学的分支。有这个和没有这个大不一样”^[2]。他们还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从理论与实践的相合上，提高了我省的工作质量和学术水平，使四川考古有机地融入了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之中。

1987年4月在成都广汉举行的“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座谈会”，是文物局专家组在新思路指导下举行的六七个小型专题座谈会之一。会上不仅收获了几年来在典型遗址上进行有计划发掘的成果，如三星堆古城、祭祀坑、十二桥木建筑群群的发现，开始提出“三星堆文化”的命名；而且又从“探索文明起源”，“回答中国人是怎

样团聚到一块的”这样一个伟大系统工程的高度,审视规划了四川今后的考古工作。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指出“四川这段工作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看两个坑和城,不妨说是看到了四川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从无阶级到阶级,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各地有各地的发展过程,都在继承前代文明,创造新的文明。这就是我们这次会的新内容”。“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特征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下一步“要从长远的角度规划我们的工作任务”,从区系和文明起源的高度,去探索各地古文明的进程和特征^[3]。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系统化”,和“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是进入“中国考古学新时期”的两个标志^[4]。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八十年代前后四川考古取得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成绩。下面选择几个重点课题做一介绍。

二、重要发现与科研成果

(一) 考古调查与试掘的全面开展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进行了一系列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考古调查,为摸清家底和寻找课题创造了条件。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峡考古调查和全省文物普查。

1984至1987年根据上级布署,我省集中数十人的专业力量,对川东三峡库区进行了两次专题考古调查,编写了文物保护规划大纲,提出270多个需要保护发掘的工作项目。虽然与九十年代国家文物组织全国力量进行的全面调查规划有一定的差距,但绝大部分重点项目已经包涵其中了。特别是通过这次调查锻炼了队伍,明确了课题,也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工作创造了经验。在“配合之中找课题,带着课题搞配合”的方针指导下,试掘了一些地点,取得可喜的成果,如在忠县中坝遗址发掘了9米厚的文化层,共分40多层,主要部分可分为三大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周战国,为川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文化分期和序列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5]。

1986至1989年,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安排下,我省动员了数万人员,进行了全省大规模的

文物普查,共登记各类文物3万6千多处,大体摸清了家底,使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虽然早期古遗址等数量比预期的少,但也在各地区发现了一批重要线索。为进一步巩固普查的成果,做好考古学区系文化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有选择地试掘了几处古遗址,都有重要的收获。如阿坝州丹巴县中路罕额依遗址,年代为距今5000年到距今2000年,可分为三期,发掘了10多座石砌房屋、灰坑、墓葬和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周边地区同时期古代文化遗址的崭新的文化面貌,已建议命名为“罕额依文化”^[6]。达州通江县擂鼓寨遗址、南充阆中县坪上遗址^[7]的发掘,分别为研究川东北渠江流域、川中嘉陵江流域石器时代与商周时期的区系文化类型提供了依据。

20世纪80年代我省还主动进行了专题考古调查和试掘,如长江沿线的旧石器调查、川西六江流域综合调查和大石墓石棺葬的调查试掘、荣经“严道古城”的调查勘测发掘等。还有中央和各地的一些科研单位入川进行调查和合作发掘,均有重要收获。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川北广元、绵阳的调查,对中子铺、张家坡、边堆山等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地区和时代上的空白^[8];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在川东的调查和巫山龙骨坡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两百多万年前的“巫山人”和“龙骨坡文化”,为人类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9]。成都市、重庆市也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了队伍,为20世纪90年代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省最重要的考古收获,当属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成果。1929年在广汉月亮湾发现玉器后,1933年和1963年在此进行了两次发掘,先后对附近做了多次调查,1956年发现了三星堆遗址^[10]。对三星堆遗址有计划系统发掘,是从1980年开始的。当年春天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到三星堆调查,在三星砖厂正在取土的“三星堆”土堆两侧发现了厚厚的文化层和丰富的文物,单位很快决定组队发掘。1980年5月进行试掘,1980年11月到1981年5月正式发掘,将文化层分为三期。1982年在三星堆西南

进行第二次发掘,有上下两个文化层,下层同于第一次发掘的第三期,上层被定为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11]。发掘期间我们曾向国家文物局专题汇报,庄敏处长来现场考查后,拨出两万元专款予以支持。1984年三星堆考古得到参加全国考古汇报会的专家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做了具体规划。1984~1985年对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和分布进行全面调查,发现这是一个由数十个遗址组成面积约12平方公里的遗址群,东、西、南可能有城墙,开始提出“三星堆古城”的看法。1984年秋在遗址群北部“西泉坎”发掘出典型的“一期”文物。1985年对“三星堆”土堆两侧进行发掘解剖,确认“三星堆”是人工修筑的。为进一步弄清遗址的价值以确定保护方案,1986年3~6月,我们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一起,分三区进行较大规模发掘,将2.5米厚的文化堆积分为16层,包含了一至四期的大量典型文物和重要遗迹现象,取得丰硕成果。国家文物局专家领导到现场检查指导,充分肯定了这次发掘的意义和价值,并与地方政府一起确定了“拆迁砖厂,全面保护三星堆遗址”的方案。

正当室内整理全面开始、砖厂生产基本停工之时,1986年7~9月留守的民工取土时先后发现两个大型祭祀坑。在砖厂整理文物的考古人员立即保护了现场,收集了文物,经报批后进行了正式发掘。大家冒着酷暑,日夜奋战,发掘出青铜人像、神树、金杖、玉器等1700件珍贵文物,揭开了古蜀文化神秘而奇特的面貌,进而提出祭祀活动是三星堆文化重要特征的观点,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12]。

1988年初“三星堆遗址”正式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弄清遗址周边“土埂”的状况和性质,以确定“三星堆古城”的时代和范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1989年开始我们对城墙进行了六次发掘,确认了东、西、南三面都有夯筑的城墙,构成一个3.6平方公里的大城,时间在距今4000至3000年左右,从而确立了三星堆古城曾是古蜀文明中心和古国都邑的历史定位^[13]。

(三) 十二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1985至1989年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掘,是八十年代我省又一个重大考古收获。考古工作是

配合基建工程进行的,最初是发掘遗址西半部的隋唐窑址。1985年12月遗址东半部3米多深处基建发现了木构件和尖底器等早期文物,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进行抢救发掘,在第10至13层发现了大量商周时期的器物和木建筑遗存,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文物相似。特别是大型木构建筑群的发现,对研究古蜀文化和中国建筑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在专家论证和国家文物局领导现场指导后,决定扩大发掘和保护力度,由省考古所和市考古队共同组成发掘组。1986年5月后进入科学考古发掘阶段,清理出带廊道的“T”形干栏式木构房屋基址(长约25米,宽7米,廊道长22米)、带榫孔的大型地梁建筑成组构件(长达4.6米以上)等多种木构建筑,形成一个规格庞大的建筑群体,为研究古代蜀地的建筑形制风格、技术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是对中国建筑史商代部分的一个重要补充。

1987年4月“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座谈会”期间,专家们认为在城市中心发现的十二桥遗址很重要,出土遗物具有自身文化特色,发现大房子说明成都当时已不是寻常的村落,而是一座城市。要加强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尽快拿出阶段性成果。1987年12月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将商周时期遗存分为三期,概括了尖底器等典型器物群的特征、组合与演变过程,及其与三星堆文化的异同,为以后定名“十二桥文化”奠定了基础^[14]。

根据1988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关于十二桥遗址保护意见的批复”,1989年征用了古文化遗址现场保护区,划定了保护范围。在技术手段达不到保护要求的条件下,将发掘区回填保护。而对与十二桥遗址相关的古文化遗存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全面展开,直至“金沙遗址”的突破性发现和“十二桥文化”的正式命名。

(四) 其他考古收获与巴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初步建立

20世纪80年代我省在早期古遗址古墓葬发掘中还有许多重要收获。如攀枝花市廻龙湾旧石器遗址发掘,乐山、雅安、凉山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掘,成都方池街、指挥街、抚琴小

区等商周遗址的发掘,1980年彭县竹瓦街西周大型铜器窖藏的发现^[15],1987年三星堆仓包包祭祀坑的发现等^[16]。1980年在新都发掘的有独木棺和8个边厢的大型战国木椁墓,发现了一套(188件)完整的高等级青铜礼器,证明它可能是某一代开明氏蜀王墓^[17];涪陵小田溪巴王族墓地,又发掘了几座土坑墓;在荣经同心村、什坊城关镇发掘了以船棺为特色的大型巴蜀墓群^[18],等等。战国秦汉以后的广汉“雒城”遗址、川西大石墓、石棺葬、以及汉画像石、画像砖墓、唐宋墓葬发掘,也都有重要收获;特别是隋唐时期邛窑、青羊宫窑等一系列古窑址的调查发掘,揭开了四川陶瓷史研究新的一页,不再一一列举。在此基础上,全省出现了一个学术研究的热潮,先后召开了“巴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等许多不同形式规模的研讨会,就相关学科广泛的学术问题,发表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论文、报告和简报,出版了多个文集,包括《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等。我所1984年创办的《四川文物》,以宽松的思想和较大的容量,成为活跃学术研究培养锻炼队伍的重要阵地。

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成果很多,其中具有基础意义的,是巴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初步建立。从三星堆等遗址的系统发掘开始,就有不少学者关注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期^[19]。随着各地新材料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典型遗址分期的细化和众多测定年代的发表,为四川考古文化的分区与分期研究创造了条件^[20]。1987年发表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首次考古报告中,将1980至1982年发掘的资料分为四期^[21]。此后几年的发掘和测定结果,进一步印证和补充了四期的内涵,认识到从距今约4800年前到3000年左右的两千余年间,在三星堆地区存在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古文化序列。“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800~4000年左右。“二期”年代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测定数据在距今4000~3600年左右。“三期”时代相当于商代中晚期,测定年代大约在距今3600~3200年左右。“四期”在商代末期到周初,测定年代为距今3100~2875±80年,延续时间在距今3200~2800年左右。这样就以考古方法建立了一

个四川早期考古文化的发展序列^[22]。

联系到当时已发现的商周时期成都古遗址群,和战国前后以船棺葬为代表的晚期巴蜀文化,表明巴蜀考古学文化经历了距今4800年到距今2000年前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进程,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体系,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三星堆一期文化,约在距今4800年—4000年前;第二阶段为三星堆遗址二、三期,约在4000~3200年前;第三阶段是以成都古遗址群为中心的殷商西周至春秋时期,距今约3200~2600年左右;第四阶段为春秋战国巴蜀并存时期,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第五阶段从秦并巴蜀到汉武帝以前,在公元前316年至公元前100年左右,共同构成了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千年文化进程,这就是八十年代四川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为我们展现的巴蜀考古学文化体系^[23]。20世纪90年代以后,众多学者对各时期考古文化进行了重新命名,对“巴蜀考古学文化序列”问题,大体形成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秦汉初期的文化融合等发展阶段的学术共识^[24]。

进入新世纪,考古事业从理论到实践都更加科学,更加规范。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四川考古,许多工作还是初步的,尚有一些不足之处值得总结改进。但当时的工作热情和很多成果,却是令人难忘的,在四川考古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注释:

[1][2] 苏秉琦:《提高学术水平,提高工作质量——在文化部文物局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3] 苏秉琦:《西南地区考古——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同上书)。

[4] 苏秉琦:《文化与文明——1986年10月5日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同上书)。

[5]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8月。

[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7] 胡昌钰 孙智彬:《阆中县坪上商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

[8] 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

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9] 黄万波、方其仁：《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

[10] 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33-1934年6卷；林名钧《广汉古代遗址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1942年3卷第7期；王家佑、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11][21] 四川省文管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2期。

[12] 四川省文管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陈显丹：《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9年。

[13] 《广汉三星堆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5日。

[1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2期；江章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分期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 范桂杰、胡昌钰：《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

古》1981年第6期。

[1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等：《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7]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管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什邡市城关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9] 赵殿增：《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7年第10期。

[20] C14测定年代，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出版。一号坑测定数据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提供。

[22][23]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24] 孙华：《试论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赵殿增 陈德安：《巴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的新进展》，《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

（上接第81页）

武则天的共同经营下，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尤其是武周时期，更是洛阳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则天女皇大展才华的时期，将贞观之治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又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对洛阳的贡献，武则天所做的大事，无一不与洛阳有关联。本文只就含嘉仓和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可能是一孔之见，不登大雅之堂，望大家赐教。

注释：

[1][2] 《资治通鉴》卷一八零，大业二年十月，十二月。

[3] 《大业杂记》。

[4]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5]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武德四年三月。

[6]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

[7][8] 《贞观政要》卷八《务论农》。

[9]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118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10][11] 李国珍、张家林：《中国盛世皇帝传》96，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

[12] 《新唐书·食货志》。

[13] 《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

[14] 《大唐诏令集》卷一零《诫励风俗勅》。

[15]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16]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17] 张显朗编著、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第一册30页，引罗马史家白里内所著《博物志》。

[18] 《洛阳伽蓝记序》。

[19] 《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0][21] 《洛阳伽蓝记》卷四《西域》。

[22] 《大唐西域记》卷一上。

[23] 《全唐文》卷三一九《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

[24] 《元河南志》。